

抗战时期权力下探的一个意外收获。

抗战期间的权力下探,和战时党、军队、政权、干部的利益一体化大有关联,统一战线又给了中共充分运用这种利益一体化的空间。中共的新社会,之所以为新,关键在于政治力量以空前强势的姿态进入社会,承担起社会改造的责任,并逐渐取代社会本身的职能。一个政治主导型社会由此降生。这样的社会,带来了严格的管理、高度的效率,保证中共政策的迅速贯彻实施,以及资源汲取能力的空前增长,战争时期,这样的管控效能特别明显。不过,社会本身毕竟有其自身运行的逻辑,政治力的过度管控也难免使社会运作失去弹性,由此带来的问题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可以逐渐看到。应该说,无论多么成功的经验,都有其一定的时代性,当抗战结束,形移势易后,抗战的经验固然仍可发挥一定作用,但必然会有一个递减的过程。历史的经验就是:所有的历史经验都是一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

[作者黄道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高士华)

《日本窃取钓鱼岛始末:史料与考证》翻译出版

村田忠禧著,胡连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 7 月出版,20.5 万字,69 元

村田忠禧《日本窃取钓鱼岛始末:史料与考证》(『史料徹底検証尖閣領有』、花伝社、2015 年)一书,今年 7 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是村田教授继《日中领土争端的起源——从历史档案看钓鱼岛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之后有关钓鱼岛问题学术著作的第二个中译本。全书以明治政府外务省、内务省、冲绳县之间往返公文档案等为依据,揭示了日本从 1885 年开始“冲绳近海无人岛调查”到 1895 年通过内阁决议窃取钓鱼岛这一长达 10 年的历史过程。本书的一大特点是注重使用第一手史料,完全以当时的日本政府外务省、内务省等部门的公文档案为依据展开论述,在对相关史料进行全面缜密考证的基础上,村田教授揭示了日本窃取钓鱼岛的历史过程,批驳了日本政府妄称的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日中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没有搁置一说等主张。此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以“附录史料”的形式,用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了有关钓鱼岛问题的明治政府公文档案。如史料 8《久米赤岛、久场岛、钓鱼岛三岛调查书》、史料 13《井上馨外务卿致山县有朋内务卿》等。总的来说,本书对于我们了解日本档案史料中有关钓鱼岛问题的来龙去脉十分有益,值得推荐。(李丽丽)